

中国近代军事史学术讨论会 论文汇编

(二)



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

中国近代军事史
学术讨论会论文

学习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反 “围剿”斗争中的辩证方法

山东大学历史系 王兆良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内 容 提 要

本文通过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反“围剿”战斗实践中关于“诱敌深入”作战方针的运用，以及“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反对，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的法宝。

文章指出，诱敌深入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这种退却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防御的第一阶段。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二阶段，即寻找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反攻得胜，不仅可以恢复在战略退却时所丧失的土地，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

文章以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为例，分别阐述了通过诱敌深入“了解敌情、先打弱敌”和“逆其锐气、击其惰归”以及把敌人引诱到人民条件地形条件都对红军有利的情况下再进行反攻所取得的辉煌胜利。文章并阐述了到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反对“诱敌深入”，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寸土”，所造成的失败。研究其失败的原因，从思想根源上来说，完全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头脑中作怪。他们不进行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中敌强我弱的基本特点，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不能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不懂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辩证道理。

通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战争实践中制定出的“诱敌深入”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

是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光辉的科学真理，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不仅对我军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有重要意义。就是对当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习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反“围剿”

斗争中的辩证方法

王兆良

(一)

北伐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等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地区秋收起义的武装力量，正式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于同年十月上了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了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农村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新局面。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也来到井冈山会师。一九二九年，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领导的工农红军又向赣南、闽西发展，建立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一九三〇年六月，全国各地已经建立了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也扩展到十几个军，约十万人，并陆续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其他许多红军部队。

工农武装割据的深入发展，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极端恐慌。他急忙调兵遣将，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进行连续不断的反革命“围剿”，红军则进行了反“围剿”的活动。“围剿”和反“围剿”，成了十年内战的主要形式。

面对着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和有着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刚刚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和弱小的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是什么？红军究竟采用什么方法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是当时中国革命发展中必须在理论上给予回答的重大课题。在这历史转折的严重关头，毛泽东同志挺身而出，排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干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和种种复杂的矛盾，分析了敌强我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光辉著作，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中国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完全可能的，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问题；而且，还揭示了工农红军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又不可能很快发展和很快战胜敌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在反“围剿”战争实践中逐步制定了“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歼灭战”、“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等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为我党我军总结出一套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变战略上的劣势为战役战斗上的优势，依靠人民、趋利避害、以弱制强、克敌制胜的方法。这些战略战术原则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要求红军作战要从中国革命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另一方面还要求在尊重客观条件的前提下，要高度发挥红军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

活剧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166页）这不但不违背唯物论，恰恰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因此，我们说，毛泽东同志所制定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都包含着辩证的道理，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光辉。

在这里，我们仅以诱敌深入为例，谈谈自己学习的体会。

（二）

诱敌深入实际上是一种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不能迅速地击败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伺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这种退却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防御的第一阶段。它包含着反攻的希望，要求在条件具备的时候转入反攻。所以说，诱敌深入的重要意义，在于积极防御的第二阶段，即寻找有利时机转入反攻。反攻取得胜利，不仅大量歼灭了敌人，还可以恢复在战略退却时所丧失的土地，甚至可以乘胜转入战略进攻，扩展自己的势力。

那末，究竟怎样才算是具备了反攻的条件，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大概须在退却阶段中取得下列诸种条件中至少二种以上，才算是有利于我不利于敌，才好使自己转入反攻。这些条件是：（一）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有利作战的阵地；（三）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四）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五）使敌人疲劳沮丧；（六）使敌人发生过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0—191页）

在以上六个条件中，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又是根据地条件的条件。并且由于这个条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条件也容易造成或发现。所以当敌人大批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

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

下面分别举例加以说明。

(一)把敌人引诱到人民条件和地形条件对红军有利的情况下再开始反攻。

我们以毛泽东同志亲自指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三〇年十月，蒋介石结束了同冯玉祥、阎锡山的军阀混战后，立即组织力量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蒋介石先后调集了十万人，任命国民党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采取“并进长追”和“分进合击”的战法，由北向南，向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

当时我军的情况是：一九三〇年八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由朱德同志任总司令，毛泽东同志任总政治委员，下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二十军、二十二军以及独立师等部队，共约四万人左右，正在江西袁水流域的分宜、新余、临江一带活动。为了粉碎敌人的反革命“围剿”，十月底，我军在罗坊召开了总前委紧急会议，讨论作战方案。会上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前进打”，“就地打”还是“后退打”？“前进打”就是前进到白区去打，包括打南昌、打九江。由于敌人已大军压境，这个意见很快就被否决了。“就地打”也对我不利。因为袁水流域是白区，群众条件不好，地形也不理想，所以这个意见也被否决了。最后大家都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后退打”，即退到赣江以东去打。二是后退到根据地前部打，还是后退到根据地中心区打？毛泽东同志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提出退到根据地中心地区再打。这样，就会造成有利于我而

不利于敌的条件，容易取得胜利。但是，由于缺乏诱敌深入的经验 and 害怕丧失根据地，有一部分同志反对再向后撤退。经过毛泽东同志反复动员，讲明暂时的退却是为了胜利的反攻创造条件，大家才都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即把进攻的敌人放到革命根据地里头来打。这也就是第一次反“围剿”时，中央红军所采取的“撤开两手，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一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罗坊发出撤退命令，十一月上旬，红军各部队就撤到赣江以东、乌江以北地区，使敌人进攻袁水流域扑空。十一月中旬，红军各部队退到东固地区，使敌人进攻赣江以东、乌江以北地区，再度扑空。十二月一日，红军开始由东固地区转移到黄陂、小布地区隐蔽集结，使敌人进攻东固地区，第三次扑空。

十二月中旬，敌军十万人，从吉安、建宁之线分头继续向根据地中心区进攻。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进占东固、南城；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抵富田；谭道源的第五十师进至源头，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进至洛口；毛炳文的第八师抵达头陂；罗霖的第七十七师防卫在吉安；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占据建宁。当时的情况是，吉安隔在赣江之西，建宁远在福建的白区，这两处的敌人距离红军较远，不宜选作首歼的目标。头陂是白区，洛口是游击区，容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许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张辉瓒、谭道源、公秉藩三师集中，不易决胜。张、谭两师是这次“围剿”的主力军，张辉瓒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两师各的一万四千入，张师又分置两处，我一次打一个师是绝对优势。但是，谭道源占据的源头是在半山腰上，地势较高，不好打；张辉瓒占据的东固，群众条件不好，因人民受 A B 固欺骗，一时不信任红

军，不宜选作战场。这样，红军只好继续准备，审时度势，待机歼敌。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军得到情报：谭道源的第五十师在源头大肆拉夫，准备于二十七日早晨出发，向小布进犯。毛泽东同志遂命令我军向小布开进，在小布东、南、西三面布下了一个口袋阵，准备伏击谭道源。可是，我军于二十七日等了一天，未见敌人出来，只好在当晚撤回黄陂。第二天半夜又去，等到天黑，敌人还是没有出来。有的同志沉不住气了，主张进攻源头。可是，毛泽东同志鉴于源头阵地有利于敌不利于我，同时为了慎重初战，还是说服了同志们，又率领红军撤回黄陂待机。

十二月二十八日，“围剿”军总司令鲁涤平下令已深入我根据地的五个师，围歼红军于黄陂、小布地区。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根据这个命令，率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于二十九日窜到龙冈。由于其他各路敌军的行动没有跟上，造成张辉瓒孤军深入的态势。

由于龙冈的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都对我十分有利，加之这股敌人又接近我军集中地域，所以毛泽东同志决定先打张辉瓒。十二月三十日拂晓，满山是雾，红军各部队都进入埋伏阵地，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也健步登上小别山上的总司令部指挥所，亲临前线指挥。上午十时，张师由龙冈东进，突然遭到我军迎头痛击，战斗打响；下午四时，我军发起总攻，打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战斗结束。张辉瓒以下九千人全部被歼。张辉瓒本人也在武功山附近的一个土坑里被活捉。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写的《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上半阙曾经描写了这一次战斗的情形：

“万木霜天红烂漫，

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

齐声唤，

前头捉了张辉 。”

张辉璈师的主力被歼，对敌人震动很大，吓得谭道源师向东韶跑，许克祥师向头陂跑。毛泽东同志又乘胜率领红军追击谭道源师至东韶，歼灭谭师一半。五天之内打了两仗，共歼敌一万多人，缴枪一万三千多支。这时，其他各路敌人，由于惧怕挨打，纷纷撤退。于是，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就被我粉碎了。胜利后，我军遂转入战略进攻，在广昌、宁都、永丰、乐安、南丰等县境内消灭了一些地主武装，解放了几十万群众，巩固和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二）通过诱敌深入，了解敌情，先打弱敌。

毛泽东同志指出：“弱军对于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然而当敌人开始进攻时，我们往往不知敌之分进各军何部最强，何部次强，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个侦察的过程。往往需要许多时间，才能达此目的。战略退却的所以必要，这也是一个理由。”（《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2页）

我们以毛泽东同志指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反“围剿”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后，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过了三个多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任命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围剿”军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军队，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分四路向我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其具体部署是：两边是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军，

由蒋光鼐任总指挥，率第六十师、六十一师由兴国向尤冈、宁都进攻；东边是第八路军，由朱绍良任总指挥，率胡祖玉的第五师、毛炳文的第八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刘和鼎的第五十六师，由南丰、崇仁向广昌、黄陂等处进攻；中间两路一是第二十六路军，由孙连仲任总指挥，率第二十五师（孙连仲）、第二十七师（高树勋）由宜黄、乐安向东韶、小布等处进攻；一是第五路军，由王金钰任总指挥，率第四十七师（王金钰）和公秉藩的第二十八师、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罗霖的第七十七师，由吉安、吉水、永丰一带向东固等地进攻。这样，国民党军队从江西的赣江一直延伸到福建的建宁，构成一条八百里没有完全连接的弧形阵线，向我军围攻过来。

这时，我军三万多人，正在根据地边缘地区“分兵以发动群众”。当查明国民党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已经开始后，我军立即进入反“围剿”的准备阶段。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准备工作的首要问题就是战略退却，也就是诱敌深入。因为只有这样，才便于集中兵力，了解敌情和疲惫敌人。所以，红一方面军总部于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出命令，立即脱离与敌接触，由根据地北沿向南移动，即由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一带，南移到广昌、宁都和瑞金以北地区。在诱敌深入过程中，了解到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强弱情况。总的说，全部是蒋介石之非嫡系部队。以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朱绍良的第八路军为最强或较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人数虽多，但由于从北方刚到，地形不熟，又不善爬山，到了根据地，表示恐惧，战斗力最弱。就在这时，关于先打强敌，还是先打弱敌的问题，在红军内部引起了一场争论。有的同志主张先打强敌——打蒋光鼐、蔡廷锴的十九路

军。他们搬出兵书上的战略原则，说：“战略防御必须以主力对敌之主力”。还套用第一次反“围剿”的列子，说：打了张辉瓒和谭道源，第一次反革命“围剿”不就给打破了吗？毛泽东同志不主张先打十九路军，指出：打仗既不能搬书本，也不能套经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一次反“围剿”时，张辉瓒和谭道源两个师是分散的，而这次十九路军的两个师则是集中的，上次，张、谭两师是运动之敌，而十九路军的两个师，已经在兴国、龙冈头经营了两三个月，构筑了坚固工事。所以，打十九路军实际上是攻坚。如果一时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压过来，红军就要吃亏。那末究竟先打哪一路敌人才算恰当呢？毛泽东同志提出，先打弱军王金钰。从富田打起，向东横扫，可在闽赣交界之建宁、黎川、泰宁地区扩大根据地。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耐心说服，最后都同意先打第五路军王金钰。

四月二十三日，红军先后到达龙冈地区集中。为了抓住战机，毛泽东同志决然命令红军各部队再向两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追敌而居。这时，红军处在蔡廷锴的第六十师和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之间，距蔡四十几华里，距郭仅十余华里。正面是王金钰的部队，也只相距四十华里。对这种情况，有的同志放心不下，说这是“钻牛角”。但是，牛角终究钻通了。我军三万多人，在敌人眼皮底下，等了二十多天未被发现，这不能不是“诱敌深入”和大打人民战争的长处。

五月十四日，我军从截获的敌人的电报中得知王金钰、公秉藩两师于十五日早晨开始东移，并通过侦察手段获悉，王金钰之四十七师沿现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公秉藩之二十八师经中洞向东固前进。毛泽东同志立即进行部署，令红三军团为左路，担任迂回包抄，红三军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大道前进，迎击公秉藩师；

红四军为右路抢占观音崖和九寸岭，迎击王金钰师。

一切布置妥当，毛泽东同志于十六日拂晓前率领总部指挥所上了中洞以北的白云山。当时，山头还浮动着一片片白云。到了中午，山上的白云已经消散，从右前方的观音崖、九寸岭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又过了一会，从电台里传来了公秉藩师部发出的“S O S，S O S，S O S……”求救的信号，接着，王金钰师部的电台也发出了求救的呼嚎，这证明这两个师都已陷入我军重围。经过激战，公秉藩二十八师全部和王金钰四十七师一个旅的大部被歼，缴枪五千多支。

首战告捷，我军即按预定计划乘胜由西向东横扫。十九日，红一军团追击敌人到白沙，歼敌郭华宗四十三师大部。二十三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东趋中村，歼敌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之右路高树勋一个旅。二十七日，我军进至广昌，歼敌朱绍良第八路军之胡祖玉师一个团。三十日，红三军团又直捣福建建宁，歼敌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三个团。此次战役，从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开始，到三十日结束。在十五天中，红军从江西赣江一直打到福建的建宁，横扫七百里，打了五个胜仗，歼敌三万多人，缴枪四万多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毛泽东同志在他写的《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这首词中曾如实地描写了当时的情形：

“白云山头云欲立，

白云山下呼声急，

枯木朽株齐努力。

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

赣水苍茫闽山碧，
横扫千军如卷席。
有人泣，
为营步步嗟何及！”

打破了第二次“围剿”，不仅将闯进来的敌人赶出了根据地，而且还新解放了赣江、闽西广大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中央根据地。

（三）诱敌深入，“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这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92页）中国古代军事学家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我们以毛泽东同志指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反“围剿”来说明这个问题。

国民党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后，仅隔一月，蒋介石于七月一日又发出了第三次“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命令。这一次，蒋介石筹集了三十万军队，自己亲自出马担任“围剿”军总司令，还聘请了德、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顾问作指导。蒋介石把三十万军队分为左、中、右三路：中路司令何应钦，与蒋同驻

南昌；右路司令陈铭枢驻吉安；左路司令朱绍良，驻南平。敌人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

这时，红军刚刚结束了第二次反“围剿”的战役，仍留在闽西、赣东，尚未得到休整和补充，兵力约三万人左右。通过侦察，又了解到这次“围剿”军中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罗卓英、赵观涛、卫立煌、蒋鼎文等五个师，约十万人，敌情比较严重。因此，为了减少敌人的优势，毛泽东同志仍然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主力从福建的建宁地区出发，沿着闽赣交界的武夷山脉，实行一种极端的退却，二十八日，红军各部队就到了群众条件较好的兴国地区集中，完成了战略退却的任务，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千里回师”。

七月底，蒋介石突然发现红军主力集中在兴国地区，立即命令其进入根据地的十几个师，分别由北而南、由东而西进攻，企图围歼我军于赣江东岸地区。

鉴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具体步骤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向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但是，当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突然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集中。这时，敌军九个师已分路逼近红军：北面除陈诚、罗卓英两个师外，还有蔡廷锴的第六十师、戴戟的第六十一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东西的良村一带有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上官云相的第四十七师；南面，赵观涛的第六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已进占兴国。红军处于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的严重形势。在

此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决定实行中间突破，向东面的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为了迷惑敌人，我并派出红三十五师及部分地方武装伪装主力向赣江方向佯动。果然，敌第六师赵观涛、九师蒋鼎文、十一师罗卓英、十四师陈诚被我吸引，继续向赣江方向扑去。八月四日晚，在根据地人民的掩护下，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红军三万主力，用了一个“鳊鱼窜空”的战术，巧妙地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蔡廷锴师、韩德勤师之四十华里的空隙地带，转移到了莲塘地区。第二天和上官云相军的前哨部队接触。第三天打上官云相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接着，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军避强击弱，三战皆胜，缴枪逾万，完全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这时，敌人才恍然大悟，知道红军主力原来在东而不在西。于是，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取密集的大包围的态势接近了我军。这时，毛泽东同志命令红军十二军一部趁势向乐安方向佯动，示形于北，而自己带领红军主力，在根据地人民掩护下，于八月十六日夜巧妙越过蒋、蔡、韩和陈、罗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由东西回到西面之兴^城国内集中。及至敌人发觉上当，我已休息了半月。而敌人则吃尽了根据地的苦楚，疲惫沮丧，士气低落，正如“围剿”军某旅参谋长所说，敌军“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其战斗力已大大减弱，下决心退却了。

九月初，敌军分路北撤。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主力决心乘胜追歼逃敌。九月七日，我军在老营盘歼敌蒋鼎文师一个旅。九月十五日，我军在方石岭歼敌韩德勤一个师。其余各路敌军纷纷溃逃，我军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总计此役，我军歼敌三万多人，缴枪两万多支。随后，我军转